

那是一个商品匮乏的时代，物资凭票供应；那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时代，人们的衣服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灰、白、军绿、宝蓝；那也是一个手工业落后的年代，穿衣依然靠裁缝……

“缝纫社”应运而生，一个数万人的乡镇只有一所缝纫社，逢年过节要做新衣裳要提前一个月预定，生意火爆。

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史巨变，缝纫社早已淡出历史舞台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儋州市东成镇热闹的长坡墟上，依然有一间“长坡缝纫社”在正常营业，五位年过花甲的师傅坚守于此，度过了大半生。



成立于 1950 年代的长坡缝纫社——最后的集体缝纫合作社，五位老师傅坚守到现在。

### 破败“高楼”下 五位裁缝的坚守

历史久远的长坡墟依然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沿着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，两旁的二三层楼大多是 1990 年代后的普通建筑，只是刹那间出现在记者眼前的一幢两层“高大”的小楼别具一格。虽然墙面已经严重破损，部分地方已经露出了钢筋，但是，表面的破败难掩其昔日的繁华。

说其“高大”，是因为其虽然是两层楼，但是楼层特别高，一层约有 5 米高，联想到她的年代，一看就不像是普通的住房，特别是一楼两边各有 5 个大窗户，颇有现在一些大商场的气派。

一楼摆着六部缝纫机，五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在专心致志地使用缝纫机缝补一些衣物，里面的静谧与外面的车水马龙恍若隔世。

70 岁的老师傅陈作秋，25 岁开始在这里工作；如今已 76 岁的张瑞桃，只记得 20 来岁就在这里工作了……五位已过花甲之年的师傅和他们的缝纫机在这里一待就是半个世纪。

“我们这里是集体所有制的缝纫社，有 50 多年的历史了。我大概是 20 来岁，还没有结婚就来这里当学徒了。”满头银丝的张瑞桃口齿清晰，没有戴老花镜，言语间已轻松地给针头穿线。

### 火红盛景 做衣服提前一个月预定

“那个年代，这里非常忙碌，生意非常红火。”忆当年，五位师傅语气里透着自豪。

那是 1956 年，农村都在搞互助组，初级社，政府也号召城里的小手工生产者联合起来，成立缝纫社。领头人魏振修，是个车衣技术较好的师傅，带领有 10 多人成立了长坡缝纫社。

“当时全镇也就那么几台缝纫机，大多数人们还是手工制作衣服。但是，缝纫社有缝纫机，加工衣服时间短，而且做工相对精致，因此生意一直不错。”现年 86 岁的汪明亮是第三任长坡缝纫社社长，经历过缝纫社最辉煌的时期。

据了解，当时不仅是长坡，在全国各地的乡镇、城市都有类似的缝纫社。

“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，制作一件成衣要四道工序：剪裁、车缝、粘合、钉扣子，收费是 1 元。其中车工获得收入最高 4 角，其他工序的工人大概是一人得 1 毛钱，剩下三毛上交公家。”汪明亮还记得当时收入最高的车工，月收入能达到 60 元，“这样的工资比政府的干部还要高”。

长坡缝纫社社员最多的时候达到了 70 余人，缝纫机 20 台，尽管如此，快到快过年的时候，顾客络绎不绝，缝纫社春节前的一两个月是最忙碌的，当时做一套军便服甚至需要等上一个月。

汪明亮告诉记者，长坡缝纫社一直很红火，但是在创立之初也经历过两次挫折。一次是 1958 年，大跃进后期，粮食紧张了，大家都饿着肚子，生意一下子惨淡了，缝纫社随即解散了。直到 1961 年左右，镇政府又重新组织缝纫社，但是不久，儋县政府要在全县搞缝纫社，要求长坡缝纫社支持兄弟公社，抽走了大部分技术骨干，缝纫社的生产能力受到严重削弱，几度停产。

### 20台缝纫机 服务长坡 4 万人

在长坡中学教书 30 多年的郭老师至今还记得，1973 年，长坡中学分配到一张缝纫机票，一时间成为全校老师关注的焦点，全校通过抽签的方式，最后这份幸运落在了郭老师身上，令老师们羡慕不已。

“当时一年学校才得这么一张缝纫机票，有些老师开玩笑说，长坡中学有 120 名老师，一年一张缝纫机票，倒霉的话要等 120 年才能拿到缝纫机。”郭老师笑着对记者说。

这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即使是到了 1970 年代，长坡缝纫社也仅有 20 台缝纫机，服务着长坡 4 万人口。其实，不仅是缝纫机这样贵重的机器，就连当时百姓穿衣服的布料也是凭票获取，限量供应。

如今，像长坡这样的乡镇，满街上人们穿的各种颜色、各种样式的衣服，在张瑞桃眼里当年是无法想象到的。“当时要是有人拿到几匹绿色的棉布，过来缝纫社做军便服，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。”张瑞桃竖起大拇指对记者说。

当时的衣服大多是清一色的灰、白、红、军绿、宝蓝等颜色，对于长坡缝纫社这样的乡镇缝纫社来说，制作中山装、军便服的机会并不多，青年装（上 1 袋，下 2 袋，无盖）、便衣（男服对襟、女服为大披衫）较多，有些人甚至拿几块材质不一或者颜色各异的布到缝纫社，要求做成一件衣服。

郭老师还记得，他当时有一件蓝宝色的裤子被刮破了个洞，家里找不到一块蓝宝色的布料，只好拿到了缝纫社补，结果缝纫社阴差阳错找了块米白色的布料补，后来他穿着这条裤子上街常招人指点，颇为难堪。

### 时代变迁 缝纫社逐步淡出市场

据张瑞桃介绍，眼前的这幢楼房是 1980 年盖起来的，花去了 6000 元左右，全部是社员的集资款。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楼盖好没有多久，大家都各自回家单干了。

“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长坡，很多技术好的师傅，或者在长坡墟上有铺面的师傅，都回去自己开起了裁缝店，不愿意吃‘大锅饭’了，后来又有一批人陆续去做别的生意了，当年兴旺的长坡缝纫社就逐渐衰败下去了。”张瑞桃摇了摇头对记者说。与曾经的辉煌相比，这段下坡路走了十多年，老人家似乎不愿多提及。

应该说个体户进入裁缝市场，对缝纫社构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，是其面对的第一波冲击。而第二波的冲击最为彻底，那就伴随着机械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，各式衣服都在流水线上生产，而且款式新颖，价格相对便宜，成为了生产工艺落后的缝纫社最大的冲击。当年逢年过节人头攒动的缝纫社，也随着当时的军便服、中山装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“2000 年后，长坡墟上的十几家裁缝店相继停业，取而代之的是销售成衣的各种商店。”改革开放后在长坡开了十多年裁缝店的冯必亮，喇叭裤、直筒裤、牛仔褲、披肩、蝙蝠式、拉链、西褲等都做过，还因此在镇上盖了楼，“但是终究敌不过来势汹汹的商品大潮”。岁月流转，情怀依旧。

如今，每天早上，五位老师傅依然会按时来到缝纫社，接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，最多不超过 20 元的收入。对于 1980 年代后出生的人，军便服、中山装以及缝纫社都是出现在父辈的讲述的故事中。但是，对于年过 70 的张瑞桃、陈作秋等五位师傅来说，这里有他们人生中大部分的回忆。



蓝绿灰是 1970 年代的流行色。（资料图）



一位妇女正在长坡社试穿刚做好的围裙。



71 岁的张作秋，正在用烧木炭的熨斗烫刚改好的裤子。